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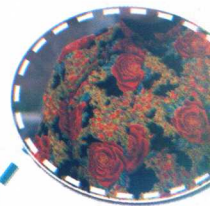
海洋文化

背景下的渔家女

服饰文化与工艺

HAIYANG WENHUA BEIJINGXIA DE
YUJIANŮ FUSHI WENHUA YU GONGYI

陈敏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安图书馆(CIP)数据

海洋文化 背景下的渔家女 服饰文化与工艺

陈敏 著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WWW.NJNUP.COM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在相关史料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大渔女服饰的款式结构、面料、色彩、工艺特点进行了研究。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为海洋文化背景下的渔家女服饰文化，第三章为泉州三大渔女所在地的福建海洋文化，第四章为泉州三大渔女服饰文化的背景及其传承发展进行概括分析，第五章从服装款式、头饰、首饰配件等几个方面分别对福建泉州三大渔女的服饰文化进行设计分析及工艺进行分析，第六章为泉州三大渔女服饰的传承发展为例，对渔家女服饰的文化寓意、现代服饰的融合，以及渔家女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分析，第七章为海洋文化背景下渔家女服饰文化与工艺，第八章为结语。本书希望传统服饰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文化背景下的渔家女服饰文化与工艺 / 陈敏著.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681-3991-5

I I.①海… II.①陈… III.①女性—服饰文化—介绍
— 福建 IV.①TS941.7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3602 号

☐ 策划编辑: 王春彦

☐ 责任编辑: 卢永康

☐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 责任校对: 房晓伟

☐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净月经济开发区金宝街 118 号 (邮政编码: 130117)

销售热线: 0431-84568036

传真: 0431-84568036

网址: <http://www.nenup.com>

电子函件: sdcbs@mail.jl.cn

河北优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装帧排版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mm×240mm 印张: 11.5 字数: 215 千

定价: 41.00 元

前言

中国海洋文化像一条龙，它从远古游来，驻足今天，又向未来奔去。它绝大多数时间被淹没在中国主流文化的汪洋之中，使许多人看不见它的样子，听不见它的声音，但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在海洋文化的影响下，福建泉州形成了独特的渔家女服饰文化。海洋文化背景下的三大渔女服饰作为海洋文化的一种符号载体，不仅体现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凝聚着沿海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学、宗教、哲学及习俗等方面的传统观念。

福建三大渔女分别是指生活在东南沿海惠安县的惠安女、泉州蟠埔村的蟠埔女和湄洲岛的湄洲女，她们都是靠海为生，以渔为业，所以被称为渔女，三大渔女以其独特的服饰穿戴习俗一直被世人瞩目。三大渔女服饰虽然各具特色，但基本形制还是沿袭传统汉族服饰的制式，上衣都是传统右衽斜襟大裾衫，下装是折腰宽腿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大渔女的服饰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我们现在看到的惠安女服饰风格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的。由于海洋独特的地域环境和渔业生产方式，“重头不重脚”是三大渔女服饰共同的特征。

本书在相关史料和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对不同区域的渔女服饰款式结构、面料、色彩、工艺特点以及三大渔女极具特色的头饰装扮习俗进行了研究。全书共八章：第一章介绍源远流长的海洋文化；第二章对三大渔女所在地的福建海洋文化进行分析；第三章对三大渔女服饰文化的背景及其传承发展进行概括分析；第四章到第六章从服饰、头饰、首饰配件等几个方面分别对福建泉州三大渔女的服饰文化进行具体介绍；第七章分别对三大渔女的服饰设计及工艺进行分析；第八章以惠安渔家女服饰的传承发展为例，对渔家女服饰的文化寓意、与现代服饰的融合，以及渔家女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海洋文化背景下的渔家女服饰文化与工艺》能让更多人了解东南沿海一带渔女服饰文化的特征，同时希望传统服饰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目录

第一章 海洋文化源远流长 / 001

第一节 海洋文化的历史印记 / 001

第二节 海洋文化行为及其社会学本质 / 006

第三节 中国海洋文化区域 / 010

第二章 福建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018

第一节 源于福建海洋文明 / 018

第二节 福建海洋文化的内容与特征 / 020

第三节 “一带一路”背景下福建泉州海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 026

第三章 福建泉州三大渔女服饰文化概述 / 031

第一节 福建三大渔女服饰地理分布 / 031

第二节 福建三大渔女服饰概貌 / 034

第三节 渔家女服饰文化的活态传承策略 / 037

第四章 蟠埔风情——大放异彩渔家女 / 044

第一节 蟠埔渔女服饰的造型及其特征 / 044

第二节 蟠埔渔女缤纷奇异的发型与头饰 / 050

第三节 蟠埔渔女独特的首饰配件 / 058

第五章 湄洲韵味——风华绝代渔家女 / 061

第一节 湄洲渔女服饰的造型及其特征 / 061

第二节 湄洲渔女缤纷奇异的发型与头饰 / 063

第三节 湄洲渔女独特的首饰配件 / 067

第六章 惠安之舞——走在海边T台的渔家女 / 068

第一节 惠安渔女服饰的造型及其特征 / 068

第二节 惠安渔女缤纷奇异的发型与头饰 / 084

第三节 惠安渔女独特的首饰配件 / 101

第七章 渔家女服饰的结构与工艺 / 105

第一节 蟠埔女服装结构与工艺 / 105

第二节 湄洲女服装结构与工艺 / 107

第三节 惠安女服装结构与工艺 / 109

第八章 渔家女服饰的传承与发展——以惠安渔女为例 / 138

第一节 惠安近代服饰纹样中的文化寓意 / 138

第二节 惠安女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 143

第三节 探究惠安女装饰图案在家纺设计中的应用 / 151

第四节 应用日本新原型设计惠安女上衣的结构版型 / 155

第五节 惠安女服饰与现代服装审美的融合 / 160

参考文献 / 175

第一章



海洋文化源远流长

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源于海洋，由海洋而生成和创造的文化都属于海洋文化；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崇尚力量，崇尚自由，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

第一节 海洋文化的历史印记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与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海洋文化包罗万象，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所有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都属于这个范围。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农耕文化（土地文化、内陆文化）而言的，前者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开拓性等特点，后者具有稳定性、内向性、传承性和温和性等特点。海洋文化所具有的特点基本与农耕文化所具有的特点相反，这其实与两种文化内在的本质有关。简单来说，海洋文化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危机文化，而内陆文化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安稳文化。

海洋文化的内在危机本质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第一，滨海自然地理环境极易

变迁；第二，无论渔业生产还是航海贸易，涉海生产劳动都充满危险；第三，滨海地区民众的家庭结构是不稳定的。

以上这些原因决定了海洋文化的内在危机本质。这种危机本质又在精神信仰层面、器物文化层面、技术文化层面等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精神信仰层面，求生是滨海民众信仰的基本目的。他们创造出来的神，无论是护航神、引航神，还是潮神、风神、礁神等，首要的功能就是祈求平安。在器物文化层面，非常明显。因为海潮很容易将遗留物带到海底，加上海风具有极强的腐蚀性，所以海洋物质文化遗产少于内陆物质文化遗产。在技术文化层面，为了应对危机，滨海民众对海洋技术的进步有着强烈的需求。当然，危机蕴含着危险和机会双重含义。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深刻地体现了在合适的条件下，海洋文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海洋文化的产业开发，也是创造种种条件，让海洋文化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发展，服务于中国海洋大国战略。

二、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蒙昧时代，滨海原始先民就利用近海的地理优势，采集贝类生物作为食物的重要来源。先民采食贝类的历史极其悠久。《韩非子·五蠹》说：古时“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说明当时先民还不会用火，处于脱离动物界不久，也就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这些贝类动物的外壳大量堆积，与当时的先民生活遗迹一起成为当代考古发现中的贝丘文化。贝丘是先民往固定地点抛弃采食的介壳类动物遗骸而形成的丘状堆积，往往分布在房址周边。一般来说，一个原始聚落会有多个贝丘。有些贝丘是被长期利用的，所以小贝丘连成大贝丘，贝丘之间相互叠压。当然，无法食用的贝壳也不是全部被抛弃，有一些经过简单的穿孔、打磨之后被制作成项链等饰品。

贝类仅仅是先民食谱中的一类海产。到了燧人氏时代，先民学会了使用火，并且学会了捕鱼的方法。《尸子·君治》云：燧人“教民以火以渔”。传说中的燧人氏不仅发明了火，还发明了捕鱼的方法。火的使用巩固了海生生物在先民食谱中的重要地位，因为烤熟的海产显然味道更鲜美。到了“教民狩猎”的伏羲氏时代，原始渔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先民逐渐学会了用网捕鱼。用网捕鱼使捕鱼活动可能脱离饱腹的最低级需求，进而出现了原始渔业经济。捕鱼技术进步的结果就是产量的增多，吃不掉的鱼可以用来进行原始交换。而鱼骨也可以用作人体饰品，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出现了钻孔的鱼眼上骨。

随着原始渔业经济的发展，独木舟和木筏等水上作业工具的制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最早的渡水工具是如何产生的，我们不得而知，古人对此有一些猜想。《世

本》中说：“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说山训》说：“见窾木浮而知为舟。”《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云：“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这是早期竹筏的记录，与木筏的制法相仿。为了控制舟、筏行驶的方向，原始人又参考鱼鳍等自然现象创制了橹、蓬、楫等工具。到黄帝时期，舟楫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考古发现证明了新石器时期我国滨海先民曾利用独木舟等工具走向海洋。

在原始部落时期，与海洋有关的经济门类除了渔业经济、舟船制造经济之外，海盐经济也得到了发展。炎黄时期，我国的海盐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以上论述可知，古代滨海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审美观念和行为等都与海洋密切相关，并形成了原始海洋文化。原始海洋文化是中华原始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从中华文化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注入了海洋的因子，具有了海洋的特征和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涉海实践以及人群交往的发展，中国海洋文化一方面向深广的海洋发展，另一方面深深影响了中国内陆地区。

从成熟的独木舟开始，滨海地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商末，纣王将周文王囚禁，文王四友之一的散宜生为赎回文王向纣王进献了砗磲（车渠）。砗磲是贝类中最大的一种，产于太平洋、印度洋和我国南海中，所以获得砗磲的航行至少要到达南海。另外，商灭之后，一部分殷商贵族乘船出海逃难，可能航行至今美洲。房仲甫对美洲出土的文物以及中国的文物和古文字等材料进行研究后，得出“殷人逃亡者偶趁大风漂泊到达美洲的推论是可以成立的”。由上述两个例子可见当时先民的远航能力。

古代吴越地区的造船术和航海术比较发达。在周王朝时期，东南沿海一带的造船技术已经比较发达，所造之船较为精美，才能敬献给天子。

先秦时期，以舟楫、渔、盐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海洋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的发达、技术的进步以及海洋经济的发展，为先民进一步探索海外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原始时期到先秦时期，先民对海洋的探索还表现在大量的海洋神话传说中。比如，《山海经》是一部反映中国先民山海观的地理著作，以古籍、传闻和想象描绘了海洋神灵和海外奇人、奇物、奇事、奇景，塑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它反映了先民对探索海洋和海外世界的渴望，正是这种探索的渴望激发了以后的种种涉海实践。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后，中国海洋文化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第一，随着秦帝国的统一，中国形成了地跨南北的统一海疆，有利于各口岸之间的联系；第二，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大修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这些工程使原来分属各地的沿海港口成为一体，并拥有了更广阔的腹地和更便利的交通；第三，齐、吴、越三个传统海上强国的造船工艺

和航海技术在统一的新王朝得到了整合发展，促进了秦帝国造船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汉代各项海洋技术继续进步，海外商业贸易更加兴旺发达。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商船去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的航线：从合浦郡的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出发，经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再陆续经邑卢没国和谶离国（均在今缅甸沿海），最后抵达黄支国（在今印度）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汉代还在滨海港口设立了最早的“海关”，官员“候”进行管理，其职能是稽查。汉王朝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海军，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曾南征交趾，率大小楼船两千艘，战士两万余人。可见，汉代楼船水军规模之大。楼船是汉代最著名的舰船，也是汉代水军的主要战船，其鲜明特征就是船上有宫室楼阁。

从秦到汉，中国海洋文化迅速发展，从海洋经济到海洋军事都逐渐建立起一个海洋大国的形象。作为统一的帝国，这一时期海洋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帝国文明的一部分。正是在海洋文化的带动下，中华文明继续发展，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

三国时期，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权采取的种种措施，如鼓励海外贸易等，促进了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吴都赋》记载：“富中之毗，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政府组织的海外开拓在这一时期也在继续，孙权曾派船队出使东南亚各国，密切了与海外诸国的商贸联系。

隋唐时期，我国又迎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在前代所积累的技术、物质和文化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十分繁荣，“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熟。当时，海外贸易主要分为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东海起航线从登州港（今蓬莱市）起航，沿黄海至朝鲜、日本列岛等；南海起航线沿黄海前往宁波，并沿宁波、泉州一路南行，一直到菲律宾、马来西亚，再穿越马六甲海峡到中亚诸国。随着航路的成熟，朝鲜、日本、印度等折服于大唐文明的海外国家纷纷遣使来华朝贡。这些朝贡活动加强了大唐与周边诸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巩固了中华文化圈，中国海洋文化由此更加昌盛。大唐帝国的统治者以分封四海来彰显中华文化的核心地位，“封东海为广德王，南海为广利王，西海为广润王，北海为广泽王。”此后，历代皇帝都派遣使者分别祭祀四海。代表海洋的四海海神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海洋文化也由此上升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元时期的海洋事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为航海和船舶制造技术以及海外贸易两方面。指南针于此时被运用到航海中，在海洋航行中具有重大意义。宋代海船建造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造船业很兴旺，东南沿海的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上海直辖市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等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规模之大、船体之精巧宏伟令人赞叹不已。此时，还发明了先进的“水密舱”设计和装甲踏轮战船，所建造的巨型海舶安全且快速，来华的

外国商人大多都乘坐中国的商船，依附中国船队进行贸易。

由于宋朝国库空虚，政府不得不大力开发海外贸易，以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重视保护外商权益，明令外商可向朝廷控告、上诉不法官商。政府还积极解决外商的困难，一旦船只遭遇海上风险将尽力给予援救。有时，也会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在种种优待政策之下，宋代海外贸易相当兴盛。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十四》）

到了元代，统治者依然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因为他们认识到“有市舶司的勾当，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元典章》卷二十二）。元代在航运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件事是大规模的海上漕运。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远离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每年都要从江南运输大量粮食以应付军饷、官俸及朝廷的各种开支，但南北大运河阻塞，江南漕粮无法北输。海运比河运更具有时间短、消耗少的优势，为了保障京师供给，元政府因此决定开辟漕粮海运。

宋元时期，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域外地理著作，如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记录了海外诸国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情况，是我国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

宋元时期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与羸弱的内政和军事相比，宋王朝的海洋事业相当发达，因此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在宋代可能已经超越了农耕文化。到了元代，统治者只将中原视作他们的牧场，农耕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反而是海洋文化因为航海贸易利润的丰厚较受重视。

明代是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顶峰时期，标志性的事件是郑和下西洋。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历时29年。郑和船队经东南亚、印度洋、亚洲、非洲等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郑和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郑和船队每次都有五六十艘大型宝船，船上装满了各种精美礼品和货品，还包括充足的食物、水和日用品。郑和的七次海上大型贸易交流活动传递了明王朝的权威，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巩固了中华文化圈，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从农耕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积极寻求海上贸易机会，从事航海贸易行业，但经济繁荣的滨海之地引来了倭寇的袭扰，这种情况在明初洪武年间的东南沿海就出现了。当时明朝强盛，海防巩固，尤其是方国珍次子方降明后，敬献了战船，使明水军数量和战斗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政府在滨海地区都设置了卫所司，若有倭寇进犯，则以烽烟报警，相互支援。到了明嘉靖年间，日本国内连年征战，倭寇数量急剧增多，大肆骚扰我国沿海各地。此时，明朝国力衰弱，

国库空虚，海防疲软。明政府因此决定改变从唐宋元延续下来的宽松的海洋政策，实行海禁。明代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时断时续。明面上的海外贸易停止，但民间走私行为并没有停止，向日本及南洋走私棉纺织品和丝织品的事情在不少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明代海禁政策阻碍了航海贸易的发展，影响了海洋文化和海洋事业。

到了清代，尤其是清初，海禁依然存在。清代限制出海船舶重量和规模，禁止海外贸易发展，只剩广州一口通商，海外交流也多是政治朝见。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因此受到重重束缚，缓步不前。同时，国内的农耕经济也出现了土地兼并、人口膨胀等问题。这是中国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发展共同受到阻碍的时期。

第二节 海洋文化行为及其社会学本质

海洋文化行为，是人类在海洋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海洋物质财产文化和精神财富文化时的动作。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海洋文化行为进行分类，不同阶层海洋文化行为的具体差异是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相关社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的具体反映。

海洋文化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将海洋文化从其中独立出来，赋予它特定的本质内涵，从而将它与陆地文化区别开来，这不仅是对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深化海洋文化的研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一切海洋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下面将具体对海洋文化行为及其社会学本质进行分析。

一、“海洋文化行为”与“海洋行为文化”

为了准确理解和把握海洋文化行为及其社会学本质等问题，首先必须厘清与之相关的行为、行为文化、文化行为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认为，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指的是人，而人是有意识的。人的意识表现为动作时，便形成了行为。可见，人的行为的基本单元是动作，所有的行为都是一连串的动作所组成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常用俗语“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来形容人的行为的多样性。

何谓“行为文化”呢？文化是以个体为载体的，文化最终必然内化到个体的内心深处，并通过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包括语言、动作、表情、礼节等。这是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外化，即“行为文化”。可见，“行为文化”是人们在其社会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洋行为文化”则是海洋社会的人们在其海洋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

如海洋环境保护行为、海洋开发行为、海洋休渔期行为等，其着眼点是分析个体的海洋行为中所折射出的一种文化。比如，沿海各地渔民保留的“龙抬头”的行为，它所折射的是渔民百姓祈愿风调雨顺的民俗传统文化。

文化行为有别于行为文化。文化行为指的是，具有高度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语境价值的行为。文化行为可以是言语的、非言语的、象征的、示意的、语用的行为。文化行为是以文化为主要外在形式的行为，其解释的核心是文化意向，即文化用意。

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

“海洋文化行为”是指人类在一切海洋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海洋物质财产文化和精神财富文化时的动作。这些动作在人们长期的海洋生活中不断被丰富，逐渐被固定，最终形成各种海洋文化行为。由此来看，“海洋文化行为”是有别于“海洋行为文化”的。前者强调的是在历经千百年形成的海洋文化背后的行为本质究竟是什么，后者强调的是某种海洋行为所体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海洋文化。因此，这里我们讲“海洋文化行为”而不是“海洋行为文化”。

二、海洋文化行为的分类

为了探究海洋文化行为背后的社会学本质，有必要将海洋文化行为予以分类。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需求导致动机行为。人的动机是由五种需求构成的，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按照他们的重要程度和发生顺序，由低级的需要开始向上发展到高级的需要，呈阶梯状。在低层次需要获得相对满足以后，才能发展到下一个较高层次的需要。当高层次需要发展后，低层次需要依然存在，只是对行为的影响作用有所降低而已。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将海洋文化行为大致分为以下五种行为。

第一种是出于生理需要的海洋文化行为。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向大海索取各种食物、资源时，从而创造了海洋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海洋饮食文化、海洋藻类药物文化等。

第二种是来自安全需要的海洋文化行为。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人们最初使用的是非常简陋的木筏、独木舟等，它不足以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于是，人们发明了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的各类舟船，如木船、轮船等，从而创造了舟船文化，并改变了世界。又如，大海变化无常，时刻威胁着依赖海洋而生活的人们生命安

全。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人们观天象,察水文,探求环流和海浪的形成等,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研究,最终成就了海洋气象学。

第三种是源于归属需求的海洋文化行为。在海洋社会生活中,有时海洋变幻莫测,使人显得格外渺小;有时大海无情,将人们陷于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面对突如其来的海洋灾难,人们需要团结互助。海洋灾难过后,面对遍地狼藉,人们更需要相互慰藉,以抚平心灵的创伤。这种相互搀扶是建立在归属的基础之上的。

第四种是寻求尊重需求的海洋文化行为。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们对海洋采取的尊重行为,即爱护海洋生物生命,遵循海洋自然规律等。如此,海洋就会以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物质来感谢并回报人类,人类也会更进一步地实施尊重海洋的行为;二是海洋常常凭借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向人类进行挑战,人类有时必须征服海洋,以造福人类。而征服海洋行为的本身已蕴含了寻求尊重的需求,即人们在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除收获了海洋物质之外,还获得了他人的尊重。

第五种是为了自我实现需要的海洋文化行为。在与海洋相处的过程中,人们希冀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并逐渐意识到人必须与海洋和睦相处,才能和谐发展,共生共赢。于是,人们的海洋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由无节制开发海洋转变为了可持续开发海洋,由破坏海洋生态转变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由放任海洋环境污染转变为了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等。人们在实施海洋保护行为的同时,完成了自身的跳跃,海洋文化行为得到了升华,即实现了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处。

海洋文化行为依据不同的行为理论,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按照主体的不同,海洋文化行为可以分为个人海洋文化行为和团体海洋文化行为。个人海洋文化行为包括个人的生长、学习、意见、观点等;团体的海洋文化行为包括团结、互助、合作、友好、谅解、默契、分歧、对抗,甚至破坏等。

按照人类活动的不同领域,海洋文化行为又可以分为海洋文化管理行为、海洋文化政治行为、海洋文化社会行为、海洋文化的文化行为、海洋文化战争行为等。海洋文化管理行为是指计划、组织、领导、激励、控制、决策、预测等行为;海洋文化政治行为包括行政、民族团结、国际关系等行为;海洋文化社会行为主要是指社会变迁、社会要求、社会保险、社会文明、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等行为;海洋文化的文化行为则是针对海洋文化开展文化艺术活动、教育活动、体育活动、学术研究等的行为;海洋文化战争行为指的是制定海洋发展战略、海洋战争等。

三、海洋文化行为的社会学本质

海洋文化行为的主体是海洋社会。关于海洋社会,原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国祯认为:“海洋社会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

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副院长庞玉珍认为:“海洋社会是人类缘于海洋、依托海洋而形成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以其独特的涉海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具有特殊结构的地域共同体。”这个“社会组织”和“地域共同体”的各种行为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海洋文化。

比如,海洋休渔行为。休渔行为并非是渔民和政府的自发行为,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恰恰是海洋社会的人们和政府正确认识海洋开发行为的结果。

近年来,由于渔业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渔民因致富的强烈愿望导致的酷捕滥捞,使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过度,渔业资源严重衰退。人类开始遭到报应,如汛期无鱼、某些海洋生物消失,一些资源甚至枯竭。面对这种情况,渔民与政府采取了不同的行为方式。靠海吃海的渔民们仍然是我行我素,只是捕捞的地点由近海改为远海,航程越来越远,所获愈来愈少。与此相反,政府官员与海洋科学工作者主张实行伏季休渔制度。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最初遭到了来自渔民及其相关利益者的不理解,甚至反对。

面对伏季休渔制度,渔民及其利益相关者与政府及海洋工作者的态度和行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以海为生的渔民们认为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渔民捕鱼捞虾,实乃天经地义,若伏季休渔,我们何以为生?结果,休渔制度遭到渔民及其相关利益者的反对。因此,当政府1995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伏季休渔制度时,仍有不少的渔民偷偷出海捕鱼。相反,政府和海洋工作者是站在保护、合理持续利用海洋资源,造福子孙后代的高度,采取了伏季休渔的行为。同一事物,两种态度,不同行为,恰好说明研究海洋社会不同阶层海洋文化行为的具体差异,可以探讨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相关社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随着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等社会条件的变迁,渔民及其相关利益者,尤其是前者,他们对待伏季休渔制度的态度已经由最初的反对到今天的认同,由被动支持到主动保护,其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究其原因,渔民们最朴实的回答,无疑为其行为的社会学本质做了最好的注脚:“国家休渔是为了让市民的餐桌上水产不断,也是为我们渔民将来的生活着想!休渔期结束之后,我们捕上来的鱼将变多了,变大了。”

伏休期间的增殖放流,不仅是渔民和政府主动保护资源的表现,也加速了渔业资源恢复的能力。因此,休渔利在当代,泽及子孙,让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行为的社会学意义,不仅是海洋社会认识海洋的产物,也是现代海洋社会追求回报、改善与海洋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无疑是海洋开发、利用及由此产生的变化进一步影响海洋文化行为的结果。

海洋文化行为千姿百态,我们无法对各种海洋文化行为的社会学本质一一予以

分析。但是,研究海洋社会中不同阶层的海洋文化行为的具体差异,可以探讨客观社会分层结构在相关社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进而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一致性的对应关系,或者说在什么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一致性的对应关系,从而集中回答有关我国海洋社会中的许多海洋文化行为问题,为海洋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三节 中国海洋文化区域

中国是一个沿海大国,有中国海,就有中国的海洋文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海洋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必定出现在与海相近的文化社区,有海洋文化特性的也必定是与海洋打交道最多的人,但不是所有与海洋相近的地域就一定能形成海洋文化区域,这主要取决于沿海地域文化的积淀和人群的人文意识。

一、中国海洋文化区域与中国沿海区域文化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物质生产的基础,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文化的主体。人类依赖物质生产得以生存,物质生产依靠人类的劳动得以实现而逐渐形成文化。

海洋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定地区的人们在一定生态环境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现象,它贯穿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海洋文化在我国沿海的形成与发展地域广阔,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具有东方文化特色。

海洋文化形成的物质生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①地域性,海洋从业者进行物质生产所形成的传统,依附于不同生态环境的自然条件;②季节性,人与自然界斗争,受自然现象的规律制约,从而形成随天体运转、气象变化而变化的季节性和周期性;③功能性,物质生产传统首先(或主要)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脱离这个需求的物质生产传统是不存在的,它具有直接的功能作用;④科学性,物质生产传统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过程中对生产对象及其规律的长期观察、感受和思考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

海洋传统是伴随中国古代渔业生活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它具有海洋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是海洋从业者在长期的观察和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文化产物。它既是生产经验的总结,又是指导生产的手段,具有明显的传承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地理环境。不同地理环境创造不同的人类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也就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第一种是广阔的高原和草原环境,这里居住着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人群,他

们随着季节的变化逐水草而居，有时还会去袭击平原上的居民，掠夺财富；第二种是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居民以农耕为主，由于随有规律的季节变化而耕种，使他们墨守成规，强大的帝国就建立在这些居民的“惰性”上；第三种是与海洋相连接的沿海地区，由于易于与外界接触，发展了商业、手工业及航海业，因而富有创业精神。

有中国海就有中国的海洋文化，有中国的海洋文化就必然有承载中国海洋文化的区域载体。按照黑格尔的理论，我们有理由断定，中国海洋文化承载的区域就是中国东南面这一片广大的海洋和与它相近的沿海地区及海岛。

给出这个判断的历史证明，还有黑格尔曾研究过的地中海及沿岸的古希腊。古希腊的沿岸多山地，海岸多险峻曲折，不适合先民们种植，但地中海比较平静、多港湾，适合于渔猎，也适合发展海上交通，沟通地中海沿岸各原始群落。古希腊的先民们在这种海洋的环境影响下，从事渔猎和最初的贸易，然后创造最初的商业文明。今天，我们把这种有贸易倾向的文明称为“海洋文明”或者“海洋文化”。整个西方世界的海洋强国的价值体系和思维观念几乎都可以从古希腊的文明中找到根源。

在中国，由于强盛的中原大陆文化和封建集权社会的作用，中国海洋文化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至今还和黑格尔一样不承认中国有海洋文化，更没有中国海洋文化区域的判定。根据笔者近几年对中国沿海和海岛的人文调查，独立的中国海洋文化区域是没有的，不论学者提到的农业型海洋文化还是贸易型海洋文化都只存在于区域文化之中，这是与西方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不同的地方。

中国有海洋文化特征的区域文化，形成文化个性并有学术分类的，从北到南大概有以下几种：一是齐鲁文化；二是吴文化，也称吴越文化；三是闽台文化，包括台湾省在内的闽南文化；四是潮汕文化；五是广府文化，也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西方特点的海洋文化；六是雷州文化。非常有趣的是，在历史非常古老、文化异常发达的辽东沿海地区、冀东沿海地区，都没有特征明显的区域文化的描述和研究，因而我们也很难界定。在山东半岛，齐鲁文化没有很多的贸易性特征，故而我们认为海洋文化的成分少。至于北方沿海地区是什么样的文化区域，有哪些海洋文化特征，还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二、吴越文化

吴越文化是指现今江浙一带的文化，这一带的文化带有较浓重的海洋文化特性。

从文化图腾来看，中国古代的先民把龙作为图腾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大地上曾出现过一些原始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黄河和渭河流域的炎帝和黄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图腾。